

赵 雨

2003年的夏天热得诡异,才入六月,太阳肆无忌惮,像个耍泼皮的孩子。

高三(2)班教室里的四个大吊扇“唰唰”旋转,犹如高悬头顶的四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坐在后排的我得不到一丝凉风的吹拂,抬头看着吊扇旋转的弧度,生怕内部哪个零件突然松掉,砸向正下方认真做习题的同学。教室里其实没多少人安于温书,距离高考还有六天,黑板上用粉笔画的倒计时表无多少人关注,老师们也不大管束学生,木已成舟,能考成怎样,基本定型,教室成了象征意义上的学习场所。

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话,揉成团,丢给前三排的她,“我们去报告厅吧,那儿凉快。”她摊开纸,看到这句话,两分钟后,我们携带几本书,离开教室。穿过热气烘烘的操场,塑胶跑道灼光闪闪,沿着甬道走下去,不一会来到报告厅。此处临河,河面的凉气裹着微风吹进窗户,学生特别多。座位紧张,一眼望去,全是黑压压的人,来晚的只能席地而坐,或卧。有的男生索性剥了外衣,脱了鞋,大厅里充斥着一种浓郁的汗臭和脚臭味。在他们脸上,无一例外透露着

大限将至的紧张与惶恐。

就在半个月前,学校发布紧急通知,今年由于非典在全国范围内席卷,高考将提前一个月进行。听到消息,我们先是浑身一颤,在这冲刺阶段,一个月或许意味着命运的两极。继而想到担惊受怕的日子能提前结束,不失为一件快慰人心的事。从那天起,学习氛围发生了变化,用功的人更加用功,近乎通宵达旦,对学习本不感兴趣的人索性破罐子破摔,就这样吧!她是前者,我是后者,我奇怪她和我怎能走到一块。那天下午,眼见报告厅人满为患,我们于是转至校河边。棕榈树下,她埋头看书,我吊儿郎当观看河景。一个念头在我心头浮现:高考结束后,我们将各奔东西,面对一份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,我想将其亲手终结。但这话此时不能说与她听,我希望她能考上

重点一本,而我,上不上大学还是个未知数。那个河边的炎热午后,她趁看书的间隙,跟我说了几句话,我只觉脑袋“嗡嗡”发胀,记不得只言片语。

白天过后,晚自习下,寝室成了另一个变形的战场,挑灯夜读已成常态,像我这样的人逆天而行,玩闹不止。深明大义室友终于忍无可忍,质问我到底对不对自己的前途负责,我洒然一笑,背出一句徐志摩老师的诗:“你有你的,我有我的,方向。”但在夜深人静,躺在床上的人,禁不住焦虑来袭,深知自己的故作豁达,其实是一种胆怯心虚。

那天终于来临时(六天之后),我执拗地将这份平静一装到底。一辆大巴开进校园载着我们前往考场。车上,我和她坐在一起,她从包里拿出一支钢笔,拿过我的

手,在我掌心写下她的名字,然后在她掌心写下我的名字,两个名字闪烁在阳光里。

我问这是干什么?她说能带来好运。我将信将疑。

距离考场几百米的××小学作为临时休息点,此时严正以待,拉开架势,每位考生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在身穿白褂的医护人员带领下测量体温。这是那年非典时期的规定动作,体温过高者将不由分说被隔离,现场洋溢着刑场般的凝重气氛,屋外过高的温度一丝一缕渗进来,口含体温器的我们如遇大刑,心惊胆战。

所幸没有一个人发生意外,如期走进考场。

在大考的两方正日子,我坐在二楼考场倒数第三排座位,带着准考证依次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数学、语文、英语、文综考卷真面目。印

象最深刻的是考数学时,几道大题自我竟一题都答不上来,后来才知道,那一届的数学是九十年代以降最难的。我的答题显得无比漫长,心想,完了,这次看来是真的完了,再假装无所谓都骗不了自己。奇怪的是,这一来,反倒轻松了,放下笔,托着下巴,看起窗外的风景:不远处有个公园,孩子们正在玩跷跷板;不知何处传来工地打桩机若隐若现的声音,小贩卖西瓜的吆喝声,万般真切。

考完最后一场,回到学校。当天晚上,整个校园炸开了锅,大家三五成群,各有各的庆祝方式。我做了一件特别标新立异的事,叫来一辆三轮车,将所有课本、参考书装上车,运到学校外的一个废品回收站,在一位年过五十的中年男子过秤之后,以三十元的价格将三年来的积累一股脑儿卖给了他。他对

我说,我是第一个来卖书的学生,问我觉不觉得把书卖了可惜?我摇摇头,不置一语。

接下来是离校,各回各家。因非典未过,理应是同学聚会盛行的日子,我们那一届学生基本上都偃旗息鼓,待在家看电视,看全国各地的非典最新消息,哪里又发现一案例,哪里又死了一个人。一星期后,我们重新返校,凭借估分,填报志愿,我和她又见了面。自考完后,我们只通了一次电话,讲了五分钟话,有些事正按我的预计,按部就班往前走,我觉得这挺好。

填满志愿,我们坐同一辆大巴回家,中途转站时,她问我报了哪里,我说第一志愿是宁波理工学院。她踌躇片刻,告诉我,她报的是杭州师范。接着,她像是下了很大决心,说,高考前在校河边问我想考哪里的学校,我的回答是杭州。我愣了片刻,想起那天她确实问过我这个问题的,但我被夏天的热气和满目河水的亮光弄得心不在焉,连自己回答过什么都忘了。

我目送她下车,留下一个背影,一切落下帷幕。我只记得她在炽热蒸腾的尘土中渐渐远去,那天的气温比入夏以来任何一天都高。

三个月后,我们去各自的学校报到,从此再没见过面。

1978：一同高考的大哥们

牧 野

2002年秋天,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专业会议。当天晚上,我们十来个人相约到住地附近的酒吧聊天。

在座同行中,最年长的是来自上海的新闻编辑胡先生。胡先生是“老三届”高中生,曾到黑龙江支边,1978年30多岁时迈入大学之门,再过五六年就要退休了。他的故事让我感到特别亲切,因为我也是那年参加高考的,我的不少大学同学都有他这样的经历。这让几个年轻记者感到吃惊,显然,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出现如此奇异的情况。

1976年,“文革”结束,次年,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,允许所有在十年“文革”期间毕业的历届初中毕业生参加高考,这其中就包括1966、1967和1968年毕业的“老三届”高中生,他们毕业时正好赶上“文革”开始,大学梦断。恢复高考,对于包括“老三届”在内的历届初中毕业生来说,都是一次改变自身命运的重大机会。但他们的加入,于我们应届毕业生却绝非好消息,这意味着,我们将与过去12年所累积的所有毕业生们同场竞争,其中的“老三届”们占有明显优势,因为他们在“文革”

前基本完成了正规的文化课程的学习,基本功相当扎实,远非那些在“文革”十年间,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时上学的初高中生们可比。

那年,我正在浙山中学(慈溪中学前身)读高中。面对突然来临的高考,我们才深切感受到之前学业荒废的痛楚,而那些成绩出众者理所当然成了学子们崇拜的偶像。

当时,教我们物理的是位姓戎的代课老师,30岁左右的年纪,鼻梁架副度数很深的眼镜,说话慢吞吞的,带着浓厚的慈溪东部口音,看人时一脸冷峻。在我们同学中,流传着戎先生的不少说法,据称他祖父在民国时期当过大官,特别重视子女教育,戎先生本人特别有才,读书成绩数一数二。1966年,戎先生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,之后其家返乡办中学,因找不到合格的老师,无奈之下只得让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戎先生代课,最后,其竟被县城的中学看中。

当时,为准备高考,学校经常进行各课程的模拟考试。各地学校还相互交换测试卷子。每次试卷下来,戎先生都会拿上一份。他点燃一根劣质烟,随意瞄上两眼,然后快速答题,数理卷几乎每次满分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戎先生那

年报考的是文科。年底时,成绩揭晓,他获得全宁波文科第一(也有人说是第二)。但当时仍强调政审,戎先生因出身成分而未能被录取。

或许对此结果早有预料,戎先生很是淡然。转眼就迎来了1978年的第二次高考。有一天,《浙江日报》报道了戎先生考得高分,因家庭出身问题而无缘大学的遭遇,戎先生一时间全省闻名。之后,便有消息传来,上级部门明确要求,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应一视同仁。

此时,在浙江中西部的丽水城,我的表哥正经历着与戎先生完全相同的遭遇。1957年,表哥的母亲,也就是我姑母被错划为右派,被从杭州下放到丽水。“文革”时期,表哥读了两年民办高中,之后便到建筑队打工,还当过锅炉工。表哥天资聪颖,又极为勤奋。1977年,他参加了第一次高考,获得丽水地区第15名的成绩,但最后未能过政审关。次年,表哥终于获得再考机会。

1978年7月6日,一个酷热之日,我和我的物理老师戎先生在慈溪,我的表哥在丽水,在同一天时间走进了考场。我报考的是文科,戎先生和表哥报考的是理科。一个多月后,成绩揭晓,我有幸成为慈

溪应届毕业生中的文科头名,而戎先生的成绩则名列全宁波理科生之首。在不到一年时间里,戎先生先报考文科,后报考理科,皆名列全市前茅,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结局,理所当然成为当时慈溪甚至整个宁波的大新闻。戎先生似乎总在制造意外,当时他填报的第一志愿竟然不是北大、清华,甚至不是浙大,而是杭大。后来,有关方面公布了一个数据,当年全国有1000多万人报考,录取率不到5%。

当年国庆过后,我和表哥相约在同一天到杭大报到,我在中文系,他在物理系,那位戎先生竟成了表哥的同学,也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位。我就读的78级中文系,共101个学生,堪称全省12年所积累文科生的精英,其中大多数人有过支边、支农、到部队当兵等经历,有的早已成家,而与我年龄相仿的60后应届生仅20来人,同学年龄最大者与最小者,刚好相差一倍。

如今,我表哥已是浙江省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。有一次他来宁波讲学,晚饭后我陪他在江边散步,看着夜色中一闪一闪的江水,不禁感慨岁月流逝之疾。我们聊起了戎先生,表哥告诉我,戎先生基本功底扎实,为人和善,被同学们称为老大哥,现已正式退休了。

一个不好不坏的分

冰块,但未见使用。

作为二三流学校的一名并不出色的学生,对于能考多少、能进什么大学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,最后的“冲刺”阶段就是按照老师的要求不断地做题。生活上,家里也没有额外的安排,也就最后几周带去的比较大杯干菜里的猪肉多了几块,还给我买过几次几元钱一大瓶的补脑汁,用褐色玻璃瓶装的,酸甜中带点涩,比较合我的口味。现在想来,保健作用肯定是没有的,至多能提神醒脑吧。同学中也有喝健力宝、太阳神、脑黄金什么的,那价格就昂贵了。

高考前夜我还是迷迷糊糊睡着了,那时独自住在亲戚家的旧厂房里,借了闹钟以防睡过头。洗漱完毕,时间还早,就在街边一家小吃店里要了一碗平时不敢奢望的肉丝鸡蛋面,颇有点好好吃一顿上战场的味道。整个考试过程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,就是每场考试之前会在太阳穴上涂风油精,还有数学考试混混沌沌,最后一两道大题没做出,走出考场十分沮丧,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。最放松的是英语听力考试,因为是第一年试点,不用计入总分(填报外语专业的可能会作参考)。我们

一帮人在考场东张西望,互相会心地挤眉弄眼,凭感觉乱填一气,监考老师也不管我们。

高考结束后隔了一两天就是填报志愿,对照下发的参考答案,我自己估计考了500多分,但并不十分确定。当初填了什么学校现在基本忘却,提前批应该报过军校,第一批填了浙江大学,这是父亲的愿望,但我心里很清楚几乎没有可能。第一批的第二志愿填了浙师大,首选教育学专业,并选择了服从调配。尽管自身条件不太适合当老师,但因为师范是当年为数甚少的尚不用交学费且有生活补助的专业,所以抱着能进大学且少花钱的心思填上了。比较有趣的是,班里几个成绩最差的同学把志愿表填得满满当当,第一批赫然清华北大复旦,也算一种自嘲自乐了。

接下来就是漫长、不安的等待。从学校回家后,便与往年一样上山下田帮助父母干农活,家里很少谈及成绩分数之事,不过看得出大家心头都惦记着。那时没有电话网络之类,同学间也没什么联系,分数基本得等到报纸上公布以后才知道,而且那年好像还是分批先后公布的。村里其他四位一起参考的

伙伴陆续打听到了各自的分,只有我的还无从得知,更增添了焦躁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在田里拔秧,父亲脸色凝重,几次自言自语,我隐约听到“不会一个都不上山吧(指考上大学,有出息)?”那一刻我心里很痛、很恐惧,我真的不敢想象万一落榜将带给父亲怎样深重的打击。

不过还好,我终于获悉了自己的分数:524分,没有上第一批录取线,但进降分录取的浙师大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是一个不好不坏的分,我其实并不甘心,也很羞愧,像我这样从小成绩优异的孩子最终只落了这么个分数、这么个大学和专业的要被别人轻视和数落的,也因此,我没有按照班主任的要求回校取成绩单,此后很多年也没踏进高中母校一步。

父母倒是变得神清气爽、笑逐颜开,于他们而言,五个子女中终于培养出了一名正宗大学生,在村人面前也能抬得起头了。尽管还得为我的住宿费、被服及书费等犯愁,八月底,父亲不顾我的竭力反对在家里置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,请来了我的村小老师和两个叔叔,像模像样地庆祝了一下。

备考

任山葳 绘

吕付平

这是一场全民皆兵的战斗。

从进入高一的第一堂课开始,老师就开始以各种方式给学生布道、洗礼:讲学习的方法,讲时间的流逝,讲高考的意义。这种理念式的灌输到了高二高三之后,就会变成非常现实的演练:补课、做题、模考、总结、再做题……“高中三年,是充实的三年,是神经紧绷的三年,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三年……”这种流行的段子并不完全是戏谑和笑话,而是真实场景的回放。对于每一个临考的学生来说,备考的过程都是一种比拼:拼智力、体力、耐力,拼师资力量,拼后勤服务。学生、学校、家长三军联合三方联动,剑指一个目标——高考成绩。这个终极目标将压倒一切。

此情此景让人感慨万千。十八年前,我也曾是高考大军中的一员,也曾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摸爬滚打了三年。那时候的高考还是在每年七月的7、8、9三天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,这个考试就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最主要的途径,以前是,现在依然如此。

回想自己的高考备战生涯,那也是紧张而充实的三年。高二开始,补课、熬夜成为家常便饭;高三开始,半月一次的模拟考试成为常态。在逐渐明白了高考的重要性之后,学生们也自觉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,学校和家长则竭尽所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后勤保障,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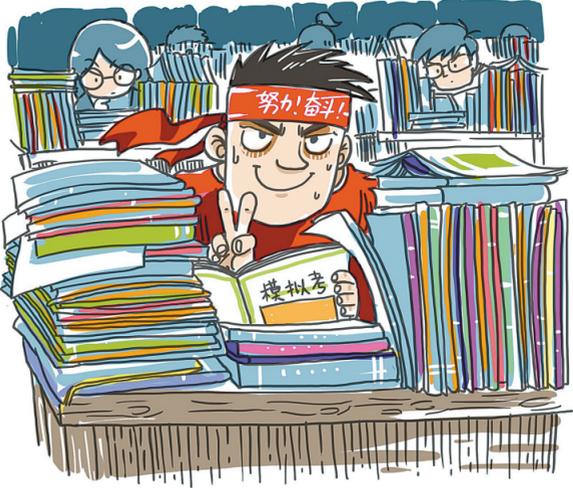
我当时所在的县城中学是省重点中学,学生来自全县的各个乡镇,相比而言,来自农村的孩子在物质保障和后勤支援上就要比城里孩子差一大截。家在农村乡镇的学生,因路途遥远回家不便,学校提供的集体宿舍又数量有限,很多人从高一开始就住在外租房,自己洗衣,买菜做饭,生活起居全靠自己,没喝过牛

奶,也没吃过什么营养品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而城里的孩子生活条件则优越了很多,衣、食、住、用等全部由家人安排妥帖,什么营养液、补脑液应有尽有。另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,高考时,城里孩子的父母,都会亲自陪考,考前考后都会给孩子一些建议、鼓励。而农村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因为距离远无法到现场陪考,另一方面也因文化水平及见识局限无法给孩子更多的参考和建议,他们的奉献和付出显得内敛而低调,甚至不易觉察,因此关于读书的事情基本上靠孩子自己去把握和解决。自强、自立是农村孩子必备的一项生活和学习技能。

记得当时考完第一科语文后,我还回到住处,和租住在隔壁的同学一起买菜做饭吃,然后又开始准备下一科目的考试。因为少不更事,父母又离得远,没有来自家庭的压力,我反而得以轻装上阵,发挥了自己的正常水平,最后考上了一个还算满意的学校。多少年后,我陆续知道父母因为我当年高考也是牵肠挂肚数夜未眠,只是我当时不知道罢了。而我同班的好些同学虽然平时学习成绩较好,但因为受到太多关注经受太大压力而发挥失常,没有考上心仪的学校,有的人不得不选择复读,期待来年。

现在,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四年了,转眼之间人近中年。当年的高考已远去,但是它让我从农村走进城市,并留在城里安家立业,完成了可以说几辈人的一个愿望,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为此,我一直对高考抱有一份敬畏与感恩。

如今大学资源越来越多,高考上线率越来越高,但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却越来越大。作为一个过来人,我希望参加高考的每一个学子,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,希望他们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,希望他们所有的努力,都能够开出丰收之花,打开老师的笑容,解开亲人的愁肠。



备考

任山葳 绘

吕付平

这是一场全民皆兵的战斗。

从进入高一的第一堂课开始,老师就开始以各种方式给学生布道、洗礼:讲学习的方法,讲时间的流逝,讲高考的意义。这种理念式的灌输到了高二高三之后,就会变成非常现实的演练:补课、做题、模考、总结、再做题……“高中三年,是充实的三年,是神经紧绷的三年,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三年……”这种流行的段子并不完全是戏谑和笑话,而是真实场景的回放。对于每一个临考的学生来说,备考的过程都是一种比拼:拼智力、体力、耐力,拼师资力量,拼后勤服务。学生、学校、家长三军联合三方联动,剑指一个目标——高考成绩。这个终极目标将压倒一切。

此情此景让人感慨万千。十八年前,我也曾是高考大军中的一员,也曾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摸爬滚打了三年。那时候的高考还是在每年七月的7、8、9三天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,这个考试就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最主要的途径,以前是,现在依然如此。

回想自己的高考备战生涯,那也是紧张而充实的三年。高二开始,补课、熬夜成为家常便饭;高三开始,半月一次的模拟考试成为常态。在逐渐明白了高考的重要性之后,学生们也自觉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,学校和家长则竭尽所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后勤保障,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。

我当时所在的县城中学是省重点中学,学生来自全县的各个乡镇,相比而言,来自农村的孩子在物质保障和后勤支援上就要比城里孩子差一大截。家在农村乡镇的学生,因路途遥远回家不便,学校提供的集体宿舍又数量有限,很多人从高一开始就住在外租房,自己洗衣,买菜做饭,生活起居全靠自己,没喝过牛